

内蒙古财经大学学术文库·第一辑

中蒙文化交流 与文化产业合作研究

The Mongolian cultur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n the cultural industry research

张智荣 柴国君 / 主编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内蒙古财经大学重点学科建设经费资助

中蒙俄经贸合作与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资助

中蒙文化交流 与文化产业合作研究

The Mongolian cultur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n the cultural industry research

张智荣 柴国君 / 主编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蒙文化交流与文化产业合作研究/张智荣, 柴国君主编.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 - 7 - 5096 - 4245 - 0

I. ①中… II. ①张… ②柴… III. ①中外关系—文化交流—研究—中国、蒙古国 ②文化产业—产业合作—研究—中国、蒙古国 IV. ①G125 ②G131.15 ③G124 ④G13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27039 号

组稿编辑: 王光艳

责任编辑: 赵晓静 许 兵

责任印制: 黄章平

责任校对: 超 凡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A 座 11 层 100038)

网 址: www.E-mp.com.cn

电 话: (010) 51915602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mm × 1000mm/16

印 张: 10.75

字 数: 20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96 - 4245 - 0

定 价: 4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由本社读者服务部负责调换。

联系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 (010) 68022974 邮编: 100836

编 委 会

主 编：张智荣 柴国君

副主编：曹 荣 李 彪

成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葱葱	王瑞永	王 琳	李景东
林海英	杨文兰	韩庆龄	

序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蒙文化交流和 文化产业合作

我国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以下简称“一带一路”），这是我国加强与周边国家往来的重大战略构想，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无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都蕴含着以经济合作为基础和主轴，以人文交流为重要支撑，秉持开放包容的合作理念。特别是“一带一路”将中亚、南亚、东南亚、西亚等次区域连接起来，有利于各区域间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建立和健全亚洲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使泛亚和亚欧区域合作迈上新台阶。同时，“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契合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是国际合作的新平台。

为了促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在2014年的北京APEC会议上，习近平主席表态，为打破亚洲互联互通的瓶颈，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在丝路基金总额中主动承担几乎近半的建设基金。此举一出，引起国内外对“一带一路”的密切关注。除此之外，未来5年，中国将为周边国家提供2万个互联互通领域的培训名额。为圆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发展梦想，中国出台如此之大的举措，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大国的担当精神。这就是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力量使然，以人文交流为纽带，夯实亚洲互联互通的社会根基。任何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文化的支撑，经济上的比拼，其实就是文化自信的竞争，只有打赢文化自信战，才可以称为真正的赢家。

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目标中可以得知，“新丝路”包括中蒙俄经济带、新亚欧陆桥经济带、中国—南亚—西亚经济带、海上战略堡垒。“丝绸之路经济带”作为中国首倡、高层推动的国家战略，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巩固世界的领导地位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古老的“丝绸之路”虽然源于我国



先秦汉唐，历经多个朝代的发展，但真正发挥其巨大作用须“还看今朝”。传统文化永远是发展现代文化的根基与源泉，丝绸之路的文化兴衰史给了今天很多有益的借鉴，兵荒马乱不仅不能发展经济还会破坏经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也离不开 APEC 倡导的和平、开放、包容、互信、互利的丝绸之路精神。文化，必定是高度自信的先进文化，又一次站在经济发展主战场的制高点上。

1000 多年前，东起长安（今西安）、西达罗马的“古丝绸之路”曾是连接中国与亚欧各国的贸易通道。在这条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通道上，五彩丝绸、中国瓷器和香料商贸络绎不绝，为古代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早期版本，这条贸易通道被誉为全球最重要的商贸大动脉。经过岁月变迁，21 世纪初，贸易和投资在古丝绸之路上再度活跃。中亚各国希望与中国扩展合作领域，为这块沃土注入“肥料”和“生机”。中国一些有识之士也不断呼吁，在现代交通、资讯飞速发展和全球化发展背景下，促进丝绸之路沿线区域经贸各领域的发展合作，既是对历史文化的传承，也是对该区域蕴藏的巨大潜力的开发。2013 年，中国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是一项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大事业。“丝绸之路经济带”不是区域组织或者自贸区这种传统区域合作的方式，也不是普通的交通运输走廊，“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更高的合作层次，它的合作内涵包括了经贸、政治、人文诸多领域，经济上既有交通、能源、金融等重点领域的合作，也有农业、中小企业以及市场中介服务等方面的合作，还包括科技、环保、旅游、卫生、教育、救灾等领域的交流。

中国与蒙古国同处亚洲，都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重要国家，同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阶段。中蒙两国边界线长 4710 千米。两国于 1949 年 10 月 16 日建立外交关系。建交几十年来，两国关系虽经历过一些曲折，但睦邻友好始终是主流。尤其是近 10 年来，两国关系发展迅速，成果显著。2014 年 8 月 21 ~ 22 日中国对蒙古国的国事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两国不仅签署了 26 项协议和备忘录，涉及政治、经贸、人文等各个领域，而且达成了进一步提升双边关系的新共识，两国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标志着中蒙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蒙古国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响应积极，基于身处欧亚之间的地理优势，结合自身国情提出了“草原之路”计划。目的是通过运输贸易振兴蒙古国经济。可以预见，中蒙两国的国家发展战略紧密相连且有很强的互补性，蒙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强烈的需求，而中国有外汇储



备、技术水平和施工队伍的优势，如果能够很好对接，对两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中蒙经贸合作，只有双方的合作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中蒙俄三方或多边合作。这是国际经济合作的必然趋势。2014年9月1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杜尚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举行中蒙俄元首会晤。习近平指出，中蒙俄三国发展战略高度契合。中方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获得俄方和蒙方积极响应。我们可以把“丝绸之路经济带”同俄罗斯跨欧亚大铁路、蒙古国草原之路进行对接，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加强铁路、公路等互联互通建设，推进通关和运输便利化，促进过境运输合作。特别是随着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运行，作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蒙古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将有机会得到资金支持。

虽然目前中蒙关系处在历史最好时期，但深化中蒙各领域的合作还有很大的空间，同时也面临一些挑战，中蒙合作仍面临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和长期历史文化因素的消极影响。虽然近年来两国高层互访频繁，政治关系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但民间交流相对滞后，互信仍是影响两国合作的最大阻力。对此，中国应努力加强与蒙古国的文化、教育、人员交流，通过文化交流与人员流动增加蒙古国人民接触了解中国文化的机会，让蒙古国的年轻一代了解历史，了解中国与蒙古国的密切关系，为中蒙经贸合作更加深入地发展创造坚实的民间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访蒙期间的演讲中指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突出了人文交流在两国关系发展中的特殊作用。许多学者认同中蒙间的文化交流有助于提升中蒙经贸关系的发展，增加中蒙间的互信。张广翠、于潇（2007）认为，在加强基础设施、农业、旅游业、矿产资源等经济领域合作的基础上，应加强中蒙双方文化领域的合作与交流，进一步增强双方之间的了解；嘎尔迪（2007）论述了文化交流对中蒙关系发展的重要作用，提出了中蒙农业文化交流、中蒙商业贸易交流及中蒙城市文化交流是加强中蒙经济文化关系和谐发展的三个途径；杨晓燕（2009）对中蒙关系中的文化冲突进行了分析，并认为中蒙文化的根本差异在于中国文化与蒙古国文化的内涵不同；王优（2009）认为，加强中蒙两国的文化合作与交流对于促进两国间相互理解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并指出内蒙古在中蒙交往中发挥着纽带和桥梁的作用，为此，双方应举办具有蒙古族特色的文体活动，比如摔跤、赛马、射箭等；王浩（2011）提出了文化认同是促进中蒙合作与发展的关键，中蒙应充分认识并发挥文化认同的作用，通过文化认同消除双方合作的各种障碍；余鑫（2013）认为，文化交流是拉近中蒙两国人民感情的重要方式，是两国人民彼此认识了解的根本途径。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对中蒙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研究仅限于其对中蒙关系的



促进作用,而对其直接效应并没有相应的研究成果,对中蒙间的文化发展问题也仅限于文化交流与文化认同的研究,并未上升到文化产业合作与发展的层面。事实上,中蒙间毗邻而居的自然条件、悠久的历史渊源、共同的风俗习惯及共有的草原文化资源是中蒙开展文化产业合作的良好基础,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文化产业合作,不仅能促进中蒙关系的全面提升,其协同发展也将使中蒙间结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促进中蒙两国文化产业做大做强,凸显其在国际市场上共同的竞争优势。在中蒙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今天,中蒙双方的合作是全方位的合作,是经贸与金融的共同推进、经贸与人文的相互融合,是油、气、电、铁路、公路的全方位畅通。但是,在这些方面中,文化交流与合作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它不仅是消除中蒙双方误解、获得价值认同的重要途径,还是促进经贸关系深度融合的重要因素。

中蒙文化交流的目的应该是传递具有亲和力的中国文化形象和独特的民族文化精髓。但文化交流不是将自身的文化强加于人,而是在承认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相互学习、借鉴、合作与融合。在全球化时代,文化交流的唯一途径是经济手段。因此,中蒙两国应紧紧抓住“一带一路”战略和“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历史机遇,以增强两国政治互信、促进经贸合作为目的,立足中蒙两国独特的草原文化资源,充分发挥内蒙古自治区的独特优势,以中蒙两国旅游、教育、影视合作为重点,构建中蒙文化交流与文化产业合作的战略合作框架,寻求符合两国人民意愿和互促共赢的合作途径,促进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可持续发展和“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现。

张智荣
2015 年

目 录

第一章 文化交流、文化产业、文化贸易	1
一、文化交流	1
二、文化产业与文化贸易	8
三、文化产业和国际文化贸易关系	11
第二章 中蒙文化交流与文化产业合作的现实选择	13
一、中蒙文化交流与产业合作是贯彻国家战略的需要	13
二、中蒙文化交流与产业合作是实现两国经济转型的需要	22
三、中蒙文化交流与产业合作是促进中蒙经贸合作的需要	27
四、中蒙文化交流与产业合作是增强两国民间交流与往来的需要	30
第三章 中蒙文化交流与文化产业合作的基础与制约因素	34
一、中蒙关系的历史沿革	34
二、中蒙文化交流与产业合作的历史沿革及其特点	35
三、中蒙文化交流与产业合作的基础	41
四、中蒙文化交流与产业合作的制约因素	44
第四章 中蒙文化交流与文化产业合作的效应分析	47
一、政治互信与民心相通效应	47
二、产业集聚与产业集群效应	52
三、资源共享与知识外溢效应	55
四、文化资本积累与培养效应	58
五、集聚人才与创新创业效应	59



第五章 中蒙文化产业的对比研究	61
一、中国文化产业现状及国际地位	61
二、蒙古国文化产业现状及国际地位	65
三、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中蒙文化产业比较优势	69
第六章 中蒙文化交流与文化产业合作的战略构想	77
一、中蒙文化交流与文化产业合作的战略目标	77
二、中蒙文化交流与文化产业合作的战略布局	80
三、中蒙文化交流与文化产业合作的重点工程	84
第七章 中蒙文化交流与文化产业合作的路径	90
一、充分利用中蒙战略伙伴关系的机遇期,强化民间文化交流	90
二、共同制定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强化中蒙文化领域的合作机制	92
三、积极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加强两国文化产品与服务贸易	95
四、推动中蒙“互联网+”领域建设,拓宽文化产业合作的领域和渠道	99
五、鼓励中蒙文化领域的相互投资和合作,共同培育草原文化品牌	102
六、加强中蒙科技合作,促进内容产业的发展	104
七、加强中蒙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合作	106
第八章 中蒙文化旅游交流与产业合作研究	108
一、国际旅游业发展态势	108
二、中蒙文化旅游交流合作的基础	111
三、中蒙文化旅游合作发展的动因	113
四、中蒙文化旅游交流与产业合作的现状	115
五、中蒙文化旅游交流与产业合作的内容	119
六、中蒙文化旅游交流与产业合作的路径	120
第九章 推动中蒙文化交流与文化产业合作的政策研究	123
一、产业政策	123
二、金融政策	126
三、贸易政策	130

四、法律政策	132
五、文化产业特区政策	133
第十章 内蒙古自治区在中蒙文化交流与产业合作中的特殊地位	136
一、内蒙古自治区具有对蒙古国独特的区位、人文、资源优势	136
二、内蒙古自治区与蒙古国经贸合作的历史与现状	142
三、内蒙古自治区和蒙古国文化交流与产业合作的现状	146
四、内蒙古自治区参与中蒙文化交流与产业合作的路径	149
参考文献	155
后记	159

第一章

文化交流、文化产业、文化贸易

“文化”由“文”和“化”两个字组成，“文”是名词，“化”是动词，“文化”不只是一个事物的名称，更表示人类的一个活动、一种行为，是以“文”去“化”人、“化”物、“化”事。具体地说，就是以“文”去感化人，以“文”去变化物，以“文”去演化事，充分说明了文化的特殊作用。^①而这种特殊作用的发挥，必须借助于强化文化对外交流，而文化对外交流又必须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强化文化贸易。

一、文化交流

文化交流是世界文化进步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推动文化全球化和多样性的内在要求。从春秋战国开始，中国就开启了文化交流的进程，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交流日益加深，最终成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一部分。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日益加深的时代，文化的软实力作用愈加突出，在国际竞争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强，所以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也就成为中国对外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文化交流的含义

文化交流发生于两个或者多个具有显著差异关系的文化源之间。没有因文化差异产生的势差，就不会很好地进行文化交流。例如，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之间

^① 徐光春. 文化的力量 [J]. 中原文化研究, 2015 (4).



是最容易产生文化交流的。在不同的文化圈层中,也能产生很好的文化交流,但前提条件是各文化主体之间须有很强的文化生产力,须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须有文化自主权,他们的交流一般只会发生在各自尊重对方的前提下。此外,文化入侵现象、强势文化压制弱势文化现象,都不是文化交流的表现。文化交流须有起始点和平等机会。顺从、勉强等都不是文化交流的本义。

文化交流有利于促进本国文化的发展和进步,维护民族文化;有利于将先进文化推向世界,扩大文化在国际上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提高文化竞争力,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推动本国文化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吸收和借鉴,取长补短,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世界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有利于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相互了解,发展友好合作的关系,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建设和谐世界。

(二) 中外文化交流及其历史沿革

位于亚洲大陆东部的中国,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逐渐由近及远地与别国接触联系,进行文化交流,如人员的往来、物产的移植、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风俗习惯的相互影响,思想、宗教、文学、艺术等的传播。交流的途径多种多样,如政府使节、留学学生、宗教人士、商人、手工工匠等,甚至战争俘虏,也曾为文化交流提供渠道。中国与各国之间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各有不同,彼此所受对方影响深浅及产生的结果,也因国家与时代而异。但中国与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历史的必然,而在与各国交光互影的漫长过程中,总的来看是中外双方相互受益。

秦代及秦以前,中国与各国的接触很少,对于当时的文化交流今天所知者不多。相传殷朝灭亡后箕子曾入朝鲜,传播了中国的教化。统一的秦王朝声名远播,古代印度称中国为秦,至今西方许多国家的语言里,中国的名称来源于秦字。

汉朝国势强盛,张骞、班超先后活跃于西域,丝绸之路的开通,使远在西亚的各国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成为可能。西亚的植物、大宛(苏联中亚费尔干纳)的名马、黎轩(当时属罗马帝国的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杂技魔术逐渐传入中国。中国的丝绸成为罗马贵族衣着所用的奢侈品,备受珍视。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各个政权需要巩固与发展,海上及陆路交通条件也有改善,近400年间与外国的文化交流远比秦汉时期发达,而佛教成为中国与许多外国文化交流的纽带。

唐时期,经过政治上的大分裂和各民族的大融合之后,隋和唐又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唐太宗李世民不仅对境内诸少数民族采取兼容并包政策,成为前代汉族帝王中未曾有过的“天可汗”,而且对境外各国采取开放政策,对中外



文化交流极为有利，以至于首都长安成为国际性城市。唐代中外贸易空前繁荣，除了横贯东西的陆上“丝绸之路”以外，海上“丝绸之路”也日渐兴起，宗教上的交流广泛而深入，尤其体现出唐代的对外开放性。有名的高僧玄奘和义净到印度和南海诸国求法，携回经典翻译进行传播。

北宋时期，中原与西域的丝绸之路交通不像唐代那样畅通无阻。但宋代社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海上贸易兴盛，自印度支那半岛、南洋群岛起，远及阿拉伯半岛。宋代制瓷业发达，瓷器继丝织品之后成为对外贸易交流的主要商品。宋代印刷术已大为发达，书籍印本广泛行销于使用汉文的日本、朝鲜、越南。北宋时，中国毕昇发明木活字，受其启发影响，到南宋时，朝鲜开始制造金属活字。宋朝的铜钱也在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地流通。

元朝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呈现出新局面。元代中国版图地跨欧亚，不仅经过中亚通往波斯、阿拉伯各地的陆路交通得到恢复使来往更频繁，而且范围更加扩大，向西直达欧洲。连接南海及印度洋沿岸各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在宋代基础上更加繁荣活跃起来。元朝统治者对于宗教只求其为大汗降福，因而采取“兼收并蓄”政策。欧洲教皇为防止中国向西侵略，同时又想联合中国抗击伊斯兰势力，多次派遣教士东来，要求结好，设教堂布教，并从事贸易。波斯、阿拉伯以及欧洲的商人更是接踵而来，其中马可·波罗一家最为有名。

明朝时期，中外文化交流远远超过昔日。政治使节、商业贸易、学习、传教、移民以至战争，各种渠道无不起作用。明代的交流涉及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许多方面，中外双方都大有受益。朝鲜、越南长期使用汉字作为记录和表达的工具，这时开始创制表达本国语言的标记。而他们的标记符号都是与中国文化交流的结果。明末朱舜水（1600~1682）东渡，促进了儒学的传播和水户学的形成。中日两国频繁贸易，互相交流具有各自特色的物品。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意外地为中朝日三国某些方面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渠道。南海方面，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在明代都曾有国王率宫眷朝臣来中国，而这些地区又移居了大量中国人，皆为前代所未有。郑和七次率船队下“西洋”，直抵非洲东岸，更是中外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的盛事。欧洲耶稣会教士东来，目的在于传播天主教，但同时带来了西方天文历算等科学知识以及测绘、机械等技术。1620年，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1577~1629）从西欧各国募集的七千余部西文著作，为中国提供了新的知识来源。利玛窦在传授西方科学知识的同时，还向西方初步介绍了中国的儒家学说。

清朝时期，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与各国的文化交流也不断进展。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之前基本上采取闭关锁国政策，并未能阻挡交流的势头。汉字文化圈中的日本、朝鲜、越南三国与清朝的文人学



者之间在文字上的往来与友谊，留下了不少佳话。清朝的医生、画家们东渡日本，日本的汉诗和有关中国古典的研究，受到清朝学者称赞。越南著名文学家阮攸（1765～1820）长于汉诗，他用字喃所著、至今家弦户诵的长诗《金云翘传》源于同名的中国小说。大批华侨把中国的种植和手工业技术以及生活习俗等带到东南亚，在那里生根开花。《三国演义》等著名古典小说，经华侨传入泰国，译成泰语，至今受到泰国人民的广泛喜爱。东来的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等，受到清廷重视，用外国人管理钦天监。他们根据科学测算，改订历法，传播天文历算等科学知识，继承了明末耶稣会士的交流活动。还有的教士从事绘画、园林建筑等，圆明园就是他们融汇了法国、意大利及东方园林艺术特征的精心之作，其“万园之园”之称，象征着东西文化交流的最高结晶。在欧洲，启蒙运动者初步接触儒家学说，对于孔子伦理道德的主张和重视教育的思想，以及儒家的自然观和政治理想如大一统及仁君统治等，都感到其拥有巨大吸引力而极为推崇，并力求为己所用。伏尔泰（1694～1778）曾赞美科举考试制度。这种早已为朝鲜、越南所仿效的以考试选拔官吏的方式，在18世纪末的法国就开始采用，之后英国继承之，成为沿袭至今的文官考试制度。在物质文化方面，中国的瓷器、漆器、壁纸等，中国式的园林、家具，都很流行。画家仿效中国画的风格与题材，皇室从中国订购特制图案的瓷器，“中国风”蔚为风尚，盛极一时。歌德（1749～1832）虽然只接触过极其有限的中国文学作品，便颇为倾倒，曾说过“他们开始创作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在树林里生活呢”。

鸦片战争（1840～1842），中国国际地位沦落，与外国的交往也不如过去自由、平等而广泛。但由于振兴中国的需要，近百年来，中国向日本及欧美学习，文化交流不论主动或被动，仍然颇为密切、广泛而深入，超过以往各个时期。日本明治维新后，中国曾有学习日本的高潮。康有为变法，即以日本为蓝本。1905年废科举后，全国各地设立学堂，大多聘任日本人任教习，而赴日留学的青年更不计其数。他们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各种社会政治学说，马克思主义最早就是通过日本刊物被中国所得知的。20世纪初，中国的先进人物，几乎都在日本受过教育，回国后在各领域产生很大影响。19世纪，中国设立了同文馆教授外文，翻译西书。严复和林纾（1852～1924）所译西方社会科学与文学名著风靡一时。西方基督教教士来中国，除布教之外也传播西方文化。19世纪时，中国已有少数留学生派往美国，但赴欧美国家留学的高潮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留学生学习内容比以前赴日所学的更为广泛，除政治、经济、法律和理工农医之外，不少人去学文学、哲学、历史、教育、绘画、雕刻、戏剧以及音乐等，从欧美各国全面吸取西方文化。中国各级学校制度仿效西方，西方教会也在中国创办各类学校，文化交流渗透社会的许多方面。五四运动提出“民主”、“科学”后，



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日益扩大。若以 20 世纪 40 年代的中国与百年前鸦片战争前后相比较,思想、宗教、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行、婚丧礼俗等,几乎社会所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这些变化有利或不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都是与外国(主要是西方,先是通过日本,以后则直接联系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果。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对中国的观感虽有变化,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则逐渐深入,对中国艺术的爱好不减当年。中国接受西方的影响在这一百年中外文化交流中始终占主导地位。

(三) 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

丝绸之路是历史上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线。中国是丝绸的故乡,在经由这条路线进行的贸易中,中国输出的商品以丝绸最具代表性。19 世纪后半期,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经过考察之后认为,丝绸贸易曾经是欧亚大陆最重要的交往方式,因而提出了丝绸之路这一说法,此后中外史学家一直沿用至今。张骞出使西域后,正式开通了这条从中国通往欧、非大陆的陆路通道。这条道路由西汉都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然后分为两条路线:一条由阳关,经鄯善,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过莎车,西逾葱岭,出大月氏,至安息,西通犁靬(今埃及亚历山大,公元前 30 年被罗马帝国吞并),或由大月氏南入身毒;另一条出玉门关,经车师前国,沿天山南麓西行,出疏勒,西逾葱岭,过大宛,至康居、奄蔡(西汉时游牧于康居西北即咸海、里海北部草原,东汉时属康居)。

海上丝绸之路,是指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海上交通的路线。中国的丝绸除通过横贯大陆的陆上交通线大量输往中亚、西亚、非洲和欧洲国家外,也通过海上交通线源源不断地销往世界各国。因此,在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将横贯东西的陆上交通路线命名为丝绸之路后,有的学者又进而加以引申,称东西方的海上交通路线为海上丝绸之路。后来,中国著名的陶瓷,也经由这条海上交通路线销往各国,西方的香药也通过这条路线输入中国,一些学者因此也称这条海上交通路线为陶瓷之路或香瓷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汉武帝之时。从中国出发,向西航行的南海航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线。与此同时,还有一条由中国向东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东海航线,它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占据次要地位。关于汉代丝绸之路的南海航线,《汉书·地理志》记载了汉武帝派遣的使者和应募的商人出海贸易的航程,提出自日南(今越南中部)或徐闻(今属广东)、合浦(今属广西)乘船出海,顺中南半岛东岸南行,经五个月抵达湄公河三角洲的都元(今越南南部的迪石)。复沿中南半岛的西岸北行,经四个月航抵湄南河口的邑卢(今泰国的佛统)。自此南下沿马来半岛东岸,经二十余日驶抵湛离(今泰国的巴蜀),在此弃船登岸,横越地峡,步行十余日,抵达夫首都卢(今缅甸的



丹那沙林)，再登船向西航行于印度洋，经两个多月到达黄支国（今印度东南海岸之康契普腊姆）。回国时，由黄支南下至已不程国（今斯里兰卡），然后向东直航，经八个月驶抵马六甲海峡，泊于皮宗（今新加坡西面之皮散岛），最后再航行两个多月，由皮宗驶达日南郡的象林县境（治所在今越南维川县南的茶莽）。

丝绸之路是个形象而且贴切的名字。在古代世界，只有中国是最早开始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近年中国各地的考古发现表明，自商、周至战国时期，丝绸的生产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中国的丝织品迄今仍是中国奉献给世界人民的最重要产品之一，它流传广远，涵盖了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各种贡献。

东西方文化交流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内涵，包括文学艺术、科技、医药、宗教、习俗等。如西方的乐舞，从汉至隋唐影响极大，主要有两大乐系：印度乐系和伊兰乐系。两大乐系的乐舞由中亚或印度传入，先在今新疆地区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乐舞，再传入内地，称为“胡乐”、“胡声”。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汉族的礼乐崩坏，甚至官方的太常乐也杂用胡声。隋唐时胡乐成分更多，就是国家大典、庙祭的雅乐，也杂以胡戎之伎；至于用于宴会、庆典的隋九部乐、唐十部乐中，胡乐占了大半。其后，太常坐、立部伎均与龟兹乐、西凉乐有关。散乐百戏，即歌舞杂技，自汉代以来，西域、天竺、罗马杂技、幻术传入中国内地，历代均有，唐代更盛。唐代软舞、健舞大多源于胡乐，最为流行的是胡旋舞、胡腾舞、拓枝舞等。上述这些乐舞形象，大多在出土的唐代金银器皿、壁画、佛座、陶俑等文物上得以再现。还有流行于唐代的马球，即由波斯或吐蕃传入。绘画、雕塑与乐舞一样，内地也深受印度及中亚的影响。随着佛教传入内地，致使内地寺院、石窟寺壁画、塑像带有印度犍陀罗风格。唐代京师长安有许多西域画家驰骋画坛。如今丝路沿途存留的众多石窟寺内，保存了魏晋以来的许多壁画雕塑，再现了东西方艺术交融的光彩。西方和印度医药也经丝路传入中国，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的《千金翼方》内，也记录了一些波斯、大秦的药方。天文历法如隋代，印度历算书陆续传入内地；著名天文学家僧一行制定的《大衍历》就利用了《九执历》的某些成果（《大衍历》是唐开元时由印度传入）。

由丝绸之路传入内地的宗教，无疑对中国的社会生活及文化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其中尤以佛教影响更为深远。佛教起源于印度，东汉时由西域传入内地，至唐代佛教逐渐中国化，中国佛教八大宗的六宗均在丝路起点长安形成并传播到全国各地。中国传统的儒学、道教及文学艺术等方面均受佛教的影响。除佛教之外，还有西方不少宗教相继传入中国内地，对中国内地的文化产生重大影响，如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丝路沿途至今还保存着不少关于上述宗教传播的遗址和遗物。中国的文化，特别是科学技术，沿着丝路也相继传入西